

# 身份认同

与华文文学研究

朱立立

著

【旗山新文丛】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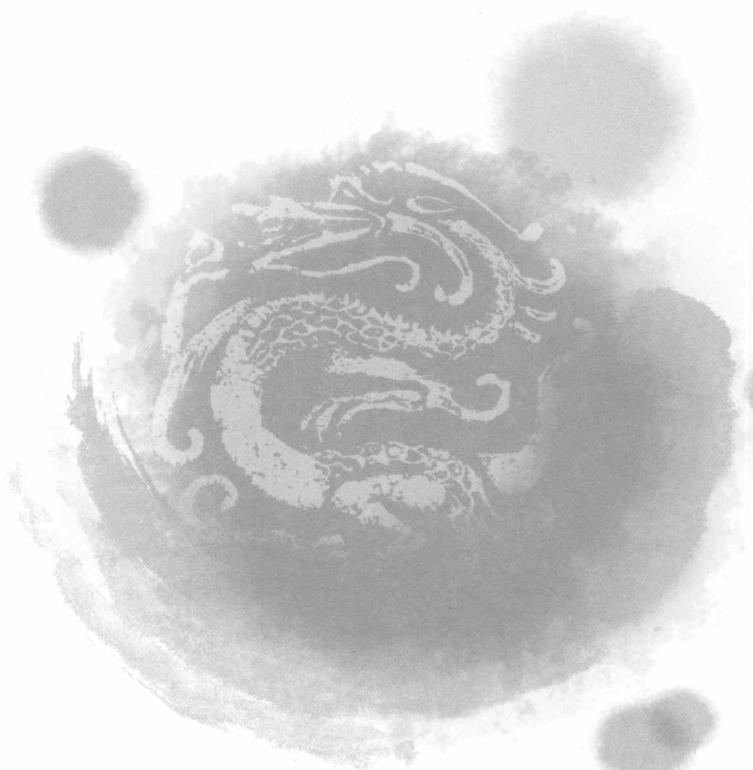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 身份认同

与华文文学研究

【旗山新文丛】

朱立立 著



# 导 言

身份认同问题,在中国大陆文学中或许并不特别突出;而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华文文学中,身份认同却是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问题:它涉及个体与族群的主体建构意识,也关乎个人与族群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它既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相关,也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的政治文化生态存在密切联系。近年来身份认同概念渐由早先的精神分析范畴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内涵日趋复杂,包含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阶级认同等等。在本书中,涉及较多的是文学中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有时兼及其他。

第一章以杨逵、林耀德、李永平三作家为观照个案,探讨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背景的台湾作家的认同意识和历史意识。第二章围绕台湾旅美华人作家<sup>①</sup>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创作,讨论有着大陆与台岛的两岸经验而又跨界海外的华人作家生命里难以更改的中国历史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从他们复杂生命经验中所演绎出的悲剧性美学想象。第三章里,笔者从历史记忆、始源想象与身份建构的层面观察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文化认同,提出应拓展知识视野,客观了解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历史过程和在地经验,避免一种主观主义的研究。第四章则针对台港地区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执,就其中二个案进行辨析与商榷,认为偏执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严重影响了

---

<sup>①</sup> 旅美时日已久,则渐成美华。亦有少数作家如陈若曦者,选择回归台湾乡土。



学术本身的客观公正性,如何超越意识形态,是两岸及海外华人学术界面临的共同课题。第五章中,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跃为台湾文学主流的都市文学及其相关论述,而非马、苇鸣等港澳北美都市作家在其诗歌和小说中呈现了尖锐的社会批判性和多元文化视野。第六章主要表现台港与海外华人女性作家的文学想象和女性生命经验之间的关联性,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描摹作为弱势社会性别的女性成员自我建构的过程和独特性。

华文文学,以优美的汉字作为编织载体,抒发中国人和华人的灵思慧质。在汉语的辽远天空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展示各自的诗性与美的想象,也书写各自的生存境遇和文化政治。在我有限的观察视域里,身份认同问题鲜明或隐晦地存在于中国大陆之外的汉语写作中,伴随着个体生命经验和族群交往过程,关乎家国情怀和历史意识,折射出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文化场域中主体建构的差异,呈现出丰富、复杂和流动的趋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问题。在台湾地区,认同问题是90年代以来人文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围绕着认同/不认同/不被认同,产生了诸多激烈论争,梳理台湾文学中的认同意识显然意义重大。在东南亚华人社会,认同问题同样存在,著名学者王赓武曾提出过多重认同的观点。在本书涉及的东南亚华人作家笔下,族群文化认同并不妨碍国家忠诚,二者的关系既有和谐交融的一面亦有微妙的矛盾。而北美的华人写作中,冷战时期旅美华人作家较多地书写了边缘人的悲剧境遇和少数民族的华人民族认同;两岸社会现实仍是这些远离家国的华人作家至为关切的对象。时至今日,则有不少华人作家选择流动的“世界人”的存在方式,显示出认同的多元性和流动性。此外,文学本体的重要性一直是优秀作家所不会忽略的。

本书中,笔者力图以身份认同的问题意识贯穿作家作品论、文学现象论以及批评的批评之文化实践。这样的研究仅仅只是一个开端,日后将得以继续和深入。

#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台湾文学中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 .....	1
第一节 庶民认同、民族叙事与左翼理想：杨逵日据时期 文学书写 .....	1
第二节 神话的建构与解构：解读林耀德长篇小说《一九四七· 高砂百合》 .....	18
第三节 身份迷思·时间寓言·语言乌托邦：论李永平 的《海东青》 .....	27
第二章 在中国想象与美国想象之间：台湾旅美文群认同 问题研究 .....	44
第一节 台湾旅美文群文学书写的历史背景与认同问题 的提出 .....	44
第二节 白先勇笔下“纽约客”的认同危机与历史性视野 .....	51
第三节 国族寓言与离散华人女性文化英雄：重读《桑青与 桃红》 .....	64
第四节 边缘人的忧郁：从认同角度看於梨华的《又见 棕榈又见棕榈》 .....	79
第五节 孤绝意识与海外华人的少数话语：丛甦小说的 认同意识 .....	84



第六节	民族意识与家国政治的辨证:陈若曦、张系国 小说分析 .....	89
第七节	荒芜的认同与超越的美学:郭松棻、李渝作品 研究 .....	97
<b>第三章</b>	<b>历史记忆、始源想象与身份建构:文化认同与东南亚 华文文学 .....</b>	<b>111</b>
第一节	华文文学与华人学的知识视野 .....	111
第二节	原乡迷思与边陲叙述:从散文看马华新生代作家的 身份书写 .....	119
第三节	历史记忆·始源想象·身份建构:马华新生代作家 的历史书写及身份意识 .....	134
第四节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现实关怀与人文追寻:马华七家 诗论 .....	147
第五节	儒者文化人格与人文理想追寻:马华诗人田思及其 诗作 .....	155
第六节	文化归属感的经营:新加坡五月诗社的诗歌创作 ..	166
第七节	华人文化传统的承传与新变:新加坡诗人郭永秀 的华语诗歌 .....	177
第八节	在家的感觉:月曲了诗歌的离散意味 .....	188
<b>第四章</b>	<b>认同、意识形态偏执与华文文化批评 .....</b>	<b>193</b>
第一节	对“鲁迅与台湾文学关系”相关论述的质疑 .....	193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评周蕾的《写在家国 以外》 .....	203
<b>第五章</b>	<b>都市、先锋与认同的多元性 .....</b>	<b>218</b>
第一节	台湾都市小说研究的理路辨析 .....	218

第二节	台湾新世代都市小说初论 .....	234
第三节	思想的芦苇:港澳前卫诗人苇鸣诗歌综论 .....	242
第四节	寻美怀旧的都市苦旅:香港作家东瑞的《迷城》 .....	252
第五节	非马诗歌的意象世界与现代性批判 .....	261
<b>第六章</b>	<b>爱·诗性·时间之伤:女性意识与华文文学</b> .....	<b>277</b>
第一节	爱·诗性·时间之伤:淡莹的诗歌 .....	277
第二节	都市女性的文化困境:90年代钟晓阳短篇小说 .....	287
第三节	女性生命家园的建构:细读小说《腐朽与期待》 .....	301
第四节	边缘人生与历史症结:严歌苓的《海那边》和《人寰》 .....	311
第五节	异域与原乡之间的华人女性:裴在美的《阿幸与 阿变》 .....	318
第六节	个体修行与古典传统:香港学者作家小思的散文 ...	325
后 记	.....	334





# 第一章 台湾文学中的历史 记忆与身份认同

## 第一节 庶民认同、民族叙事与左翼理想： 杨逵日据时期文学书写

杨逵是日据时期台湾抵抗殖民统治的典范作家。庶民身份认同构成了杨逵情感结构和价值倾向的基石，也是理解他的左翼思想和文学精神的一把钥匙。日据时期杨逵的创作，多含有以庶民记忆解构与颠覆日本殖民叙事的意味。杨逵小说文本中的左翼思想，带有整合阶级意识与民族抗争意识的特征；对于民族危难境况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追寻，作者给予了深切同情，也进行了痛苦的质疑。

### 一 庶民身份的自我认同

左翼作家杨逵的身份和认同看上去单纯其实颇有意味。<sup>①</sup> 杨逵

---

① 身份认同是一个涵义颇丰的概念，在后殖民论述中它涉及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性别认同、阶级认同等诸多方面。本文内的身份(identity)概念主要指涉杨逵建构自我认同的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中的职业性身份以及相关的认同；二是指阶级认同；三则指民族认同；四是指与个体的思想认知、情感结构、精神和信仰活动相关的价值认同。在目前的台湾文学和台湾文化的学术讨论空间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国族认同成为热门话题，其间不乏充满学理性的历史钩沉和辨析之作，但也有大量违背学术良知和历史理性的荒谬认知，有待两岸学术界共同努力加以澄清。



对庶民身份毕生不变的纯朴认同,与对知识分子身份自觉保持距离的态度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他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访谈时表示:“我莳花已近四十五年,在东京,我送过报,做过土木零工;台湾的运动瓦解后,我又干过各种活,最后进入园丁生活。我写文章,但不把自己说成是作家,而自称为‘园丁’。我写文章的量很少,因此,打开头起就没有过靠笔杆子生活的念头。”<sup>①</sup>尽管杨逵的务农和种花带有无奈退隐的意味,但终其一生,工人、农民的庶民生活是杨逵持久的日常生存样态,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则是他最基本的身份归属。建立在底层农工生活体验基础上的社会实践,为杨逵带来了生命的充实感、成就感和意义感,也给他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大地的强健力量和明朗气息。对于知识分子身份或是作家身份,杨逵则一向不以为意,上述访谈中他甚至拒绝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我不曾把自己介入在知识分子的地位中,也没有那种自我意识和自负感。……我同知识分子交往,但我不能耽溺于知识分子的名分。”<sup>②</sup>对作家身份乃至知识分子身份的淡漠甚至抗拒,反衬出杨逵在思想认知、情感结构和精神皈依上认同于庶民身份的固执和倔强。

1905年杨逵生于台南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庶民出身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朴素的阶级认同。1924年杨逵留学东京,接受了日本左翼思潮的影响,参加左翼政治团体“社会科学研究部”,介入东京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一名左翼知识人。1927年,杨逵回台湾投身农民组合运动,担任中央委员,负责政治、组织和教育三部门,在组织特别行动队、发动农民抗争活动中,先后十次被捕入狱,成为一名活跃的左翼社会运动家。30年代以后,当农民运动退潮,归隐农园以“首阳”明志的杨逵转而为笔继续自己的理想与抗争,写出《送

<sup>①</sup> 戴国辉、若林正丈“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文季》第2卷第5期,1985年。

<sup>②</sup> 同上。

报夫》、《模范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等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终其一生，底层庶民的生存经验和本色情感，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构成杨逵的精神底蕴。台湾学者许素兰在《普罗文学作家——杨逵》中曾经指出：“文学活动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结合，在台湾近代史上，似乎成了矢志于社会改革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宿命’。尤其是日据时代，较具社会意识、民族精神的台湾作家，更是无可避免地投入了社会改革、民族解放、文化重建的运动漩涡里，如赖和、张深切、杨逵、王诗琅等。”<sup>①</sup>一些论者断言：“不了解杨逵农民运动的经验，就难以理解他整个文学的基础。”<sup>②</sup>可以认为，文学是杨逵参与社会运动的别种方式。历史学者尹章义甚至主张：“作家”不过是杨逵的兼职，文学不过是杨逵的影子，文学是为其生命理想打先锋、为其实践生活做记录的工具。<sup>③</sup>这样的观点提示了“社会运动家”在杨逵多重身份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事实表明，文学书写不仅是杨逵底层庶民人生和社会运动的记录工具，更是杨逵左翼社会实践遭遇挫折后的一种战略转移，他试图在文学世界里探讨和寻求自己在现实中未能实现的社会理想和信仰。

## 二 记忆政治：杨逵日据时期的文学书写

### 1. 以文学书写解构殖民叙事：杨逵创作动机溯源

杨逵早年有感于殖民者编造、歪曲历史的叙事，乃萌发写作冲动。通过文学叙事来书写和保存被殖民者的庶民记忆，并解构日本殖民者的历史话语，成为其创作的最初动机。杨逵曾多次回忆他生命中一段难忘的体验，即1915年台湾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起义

① 许素兰《普罗文学作家——杨逵(一)》，原刊于《台湾周刊》2003年第4期。

② 杨孟《历史性的一生》，[www.freeleaf.idv.tw/essays/yang.htm](http://www.freeleaf.idv.tw/essays/yang.htm)。

③ 尹章义“杨逵与台湾农民运动”，《台湾近代史论》，第76页，台北：自立晚报社1986年版。



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

被日军血腥镇压的历史性事件，史称“西来庵事件”（又叫“噍吧阵事件”）。史载：“日人血洗甲仙埔、噍吧阵等地，台胞被害者数千，被捕二千，被判死刑的多达八百六十六人。”<sup>①</sup>屠杀造成台南县玉井乡男丁丧尽的惨剧。杨逵以个人的记忆印证了台湾人民的这段惨痛记忆：

我亲眼从我家的门缝里窥看了日军从台南开往噍吧阵的炮车轰隆而过，其后，又亲耳听到我大哥（当年十七岁）被日军抓去当军伕，替他们搬运军需时的所见所闻。其后，又从父老们听到过日军在噍吧阵、南化、南庄一带所施的惨杀。每谈到“搜索”两个字都叫我生起了鸡皮疙瘩。所谓“搜索”就是戒严吧，站岗的日军每看到人影就开枪，一小队一小队地到每家每户，到山上树林里的草寮、岩窟去搜查，每看到人不是现场杀死，便是用铁丝捆起来；承认参加的则送到牢狱，不承认的便送到大坑边一个个斩首踢下去。到我稍大，在古书店买到一本《台湾匪志》，它所记载十多次的所谓“匪乱”，当然噍吧阵事件也记载在里头，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暴政与义民的对照。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sup>②</sup>

1982年杨逵在接受访谈时再次回溯了这段个人经历，指出：1923年日本人秋则鸟川著《台湾匪志》一书中，西来庵事件的起义者“明明是对日本压迫政治的反抗，但在书中却被当作‘匪贼’来处理，

<sup>①</sup> 尹章义“中国民族奋起运动与台湾的光复”，《台湾近代史论》，第33页。

<sup>②</sup> 杨逵“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十一年前一项文艺座谈会上的书面意见”，《文季》第2卷5期，1986年6月。

我深感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我决心研读自己所喜欢的小说,并想借小说创作,来矫正这被歪曲的历史”。<sup>①</sup>而杨逵的创作,如他所说:“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抗议,自然就成为我所最关心的主题。”<sup>②</sup>

## 2. 殖民地儿女的悲哀、愤怒与抗争:杨逵文学书写的解殖性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本质矛盾是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民众抗争间的矛盾,在经济矛盾和阶级对立的背后,主导冲突仍是殖民与非/反殖民的民族矛盾。这种社会现实中,台湾的民族运动与阶级反抗运动呈现出二而为一的形态。作为民族运动积极参加者和左翼作家的杨逵,对台湾社会的矛盾实质有着敏锐认知,他作品中的反殖意识与社会阶级分析视阈紧密相关。五十年的日本统治,是假借一视同仁、日台同化的精神教育,将经济社会的差别状态掩饰,并削弱民众抵抗的意志,或以利诱欺骗,而把它们塑造为顺从的“皇民”的历史。<sup>③</sup>对于殖民者的历史叙事而言,杨逵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另类记忆”:殖民地的庶民记忆。杨逵在可能的限度里以殖民地儿女的悲哀、愤怒与抗争为自己的文学创作题旨,坚持不懈地为台湾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日据时期杨逵的创作,多含有以庶民记忆解构与颠覆日本殖民叙事的意味。《送报夫》、《鹅妈妈出嫁》、《模范村》、《蕃仔鸡》、《死》、《难产》、《泥娃娃》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记录底层被殖民者的苦难经验和深沉悲哀:《送报夫》里,台湾青年杨君的父亲因不愿贱卖土地给日本制糖会社而被活活打死;小说《死》中,贫苦农民阿达叔不堪日本殖民者与地主的合力盘剥而卧轨自杀;《无医村》里,穷人得了瘟病无钱

<sup>①</sup> 戴国辉、若林正文“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文季》第2卷第5期,1985年。

<sup>②</sup> 杨逵“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十一年前一项文艺座谈会上的书面意见”,《文季》第2卷第5期,1986年6月。

<sup>③</sup> 王小波《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第211页。



医治只能等死；《蕃仔鸡》里，台湾女孩素珠给日本老板当下女却被老板强奸，上吊身亡；《难产》中，中国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眼球腐烂……杨逵小说，从底层生活经验出发，描绘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庶民阶层地狱般的苦难图景。<sup>①</sup>

《送报夫》是杨逵的成名作，以中文写于1932年，在《台湾新民报》连载，但后半部分被官宪查禁。1934年用日文全文刊发于东京的《文学评论》，并获奖，但在台湾仍被查禁。<sup>②</sup>作者笔下，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乡土社会现实黯淡而冷酷，农民挣扎在地主和殖民主的双重压榨下。杨君的父亲在顽强抗争后被折磨而死，母亲断绝了与替殖民政权当巡查的杨君大哥的关系，弟妹们不幸饿死，最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母亲也上吊而亡，昔日里平静的村庄到处是同胞不幸的冤魂和死亡的阴影。这殖民地现实惨状的描摹是对殖民统治有力的批判。小说还展现了殖民者和地主资本家以野蛮强权合力实施殖民统治与经济压迫的事实，作品叙述制糖公司强制低价收购农民土地制造出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

……木村的警察分所主任，他一站到桌子上，就用了凛然的眼光望了一圈，于是大声地吼：

“……听说一部分人有‘阴谋’，对于这种‘非国民’我是决不宽恕的。……”

他的翻译是林巡查，和陈训导一样，把“阴谋”“非国民”

<sup>①</sup> 这里提到的《死》、《难产》、《蕃仔鸡》等篇作品，出自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四卷·小说卷1》，台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

<sup>②</sup> 1935年，祖国大陆左翼作家胡风将《送报夫》译成中文，刊于上海的《世界知识》，后又收入《弱小民族小说选》和《朝鲜台湾短篇集》，这是两岸左翼文学的一次有意味的交流。30年代中期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既强调了民族抗争也倡导大众文学，与杨逵的文学观念也可谓不谋而合。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与杨逵文学表现出的“冲创意志”颇有些近似。本文内《送报夫》引自胡风的译本即光复前版本。

“决不宽恕”说得特别重。大家又面面相觑了。

因为，对于怀过阴谋的余清风林少猫等的征伐，那血腥的情形还鲜明地留在大家的记忆里面。

“非国民”、“决不宽恕”这类字眼提示读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等级分明的位阶关系和强弱悬殊的对立关系；而所谓“阴谋”指的是被殖民者残忍杀害的台湾武装抗日领袖余清风林少猫的抗争活动。乡民被震慑得唯有顺从，选择反抗的父亲则被定了“阴谋首领”的罪名。“拖出去，这个支那猪！”父亲被打得奄奄一息，“均匀整齐的父亲底脸歪起来了，一边脸颊肿得高高的，眼睛突了出来，额上满是疮子。……身上全是鹿一样的斑点。那以后，父亲全变了，一句都不开口。”不久含恨死去。而土地还是被制糖公司用远低于市场价的低价强行收购。父亲之名被置换成“阴谋首领”的莫须有罪名以及“支那猪”这样的低贱物，而被残酷消灭。其实，“被殖民者”这个身份就是殖民地人唯一的罪名。在这个情节里，现实中的父亲之死与历史记忆中的余清风林少猫之死，乡民的隐忍和武装抗日被镇压后台湾民众的沉默，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平行同构关系。30年代，杨逵的叙述显然固化了殖民地的悲惨现实和历史记忆，“父亲”身上惨不忍睹的创伤，也是铭刻在殖民地人民心灵的伤痕。

1935年小说《死》发表于《台湾新民报》，在杨逵的作品中，这篇运用了不少闽南方言的小说细致而矛盾的人物心理分析非常突出。主人公宽意是个替地主催租逼债却又常受良心谴责的小人物，他目睹穷困潦倒的阿达叔因被逼无奈而卧轨自杀，内心充满同情和愧疚。乡亲们也兔死狐悲。作品还描摹了井上公医和警察室主任左藤面对中国农民尸身时有意昧的“凝视”——两个日本人细细赏鉴死者惨烈的形状，发出嘲笑：

“嘻！排叠得真凑巧！头壳走来在××的下面”，还以



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

戏谑的语气评论道：“脚手这样的细小、真是贫弱的人呀！看起来怕一日食无一顿饭、营养这样不良。这样的人还是死了干净。既不能做工、活着空秽地面。”

在判断阿达叔是否自杀的问题上，井上轻松地得出了结论：

哈哈！左藤君，看来明明是失注意的。么虫都也爱命，虽然他与么虫是无大差异的人，想是没有自杀的道理。因为自杀也要一点勇气，这个人一定是失注意的。<sup>①</sup>

历史上的殖民者往往将被殖民者当作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将被殖民者低贱化和降格化，二战时期的日本法西斯更是如此。杨逵以朴拙却犀利的写实笔墨揭示了日本殖民者的无耻兽性，人们不禁要问：这两个丑陋的日本人为何能够如此轻松地赏鉴他人的痛苦，毫无顾忌地枉顾和践踏他人生命的尊严？！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是自视高等国民的征服者和殖民者！他们眼里的台湾庶民只是一只低贱的“么虫”，就连死亡也不过是供他们开心的笑料。这与日本殖民者侮辱、屠杀大陆人民时的心态完全相同。

杨逵文学叙事的力量不仅表现了台湾殖民地时期的苦难，他还通过微妙的叙述激发人们的斗志，召唤人们觉醒，让人“悲哀之余，竟成激愤”（《无医村》）。强烈的情感驱使作者常常将自己的观点直接抒发出来。

小说《送报夫》著名的结句如下：

我满怀着确信，从巨船蓬莱丸底甲板上凝视着台湾的春天，那儿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



到恶臭逼人的血浓底迸出。<sup>①</sup>

在失去父母、流浪于异国他乡的杨君眼中，“台湾的春天”已然是一个丧失免疫力的肌体意象，病毒侵蚀了躯体内部，表面看仍有虚假的美丽，骨子里却已病人膏肓；这样的表述，与所谓的殖民地台湾在日治下发展了现代性的说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讽喻关系。“台湾的春天”这个肉感的意象还带有被玷污了的女性的意味：殖民地常被隐喻成易受伤害蹂躏的弱势性别。这个殖民统治下颓败阴性的台湾形象，显然是杨逵极力否定和批判的，它的病态直接指涉殖民统治的病态。而在这猛烈批判的同时，我们还感受到主人公杨君/杨逵本人从左翼斗争中获取的力量和信念。

杨逵的民族意识，不但在于他着力展现殖民地台湾庶民阶层的苦难与悲哀，还在于他的作品自觉凝聚了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原刊于1942年的短篇小说《泥娃娃》叙事线索很简单，情节简单，笔墨近乎散文化，却寓意深邃。主干内容是叙述者“我”的家庭生活，从中可以看到杨逵本人生活经历的投影，如“我”在花园里吟诵东方朔的《嗟伯夷》：“穹隐处兮窟穴自藏；与其随佞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于首阳。”现实生活中，杨逵的农场便借伯夷的典故命名为“首阳”农场，东方朔的诗句也是杨逵本人心境的自况。花圃里的劳作是辛苦的，日子也淡泊清贫，但自有一种摆脱尘世污浊的明净与充实：“满园白的、红的和黄的大理花，和其他各色的花卉争相映照。”首阳孤竹的高洁自爱在殖民情境下其意涵不言而喻。然而，遗世独立的园丁生涯也并不能避开日本军国主义的喧嚣尘世。作品开篇就展开了一幕孩子与“我”争夺空间的闹剧。“我”是一名作家，但是“我”的书桌上满是孩子泥塑的坦克、飞机、军舰和日本战斗机，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玩着日军进攻东南亚的战斗游戏。这个看似有趣的生活化场景，

<sup>①</sup> 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四卷·小说卷1》，第100页。

